

第一章 日本出兵山东的历史背景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展开了血腥的武力较量。8月23日，远离欧洲的日本也对德宣战，出兵山东，把欧洲的战火引燃到了远东。

日本何故参战？日本的统治阶级在对德通牒和宣战诏书中曾一再标榜是为了“永保东亚和平”及“日英同盟的利益”。似乎日本是在东亚和平“濒于危殆”和日英同盟的利益“濒临危境”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并非为了一己私利。

但是，历史事实告诉人们：继“北进”侵占中国东北南部，“南进”攫取台湾，并把福建划作势力范围后，日本帝国主义早自日俄战后不久，便提出了向“中国内地”扩张，并在整个中国确立“优势地位”的战略方针。1914年出兵山东，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同时也是一次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大战爆发后的远东局势和中国形势，为内外交困的日本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扩大侵华的良机。本章将依次进行深入地探讨和论述。

一、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步骤

众所周知，早在明治年间日本政府制订的“大陆政策”中，便确定了具体的侵华步骤：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中国的满蒙地方；第三步征服中国内地^①。日本的侵华行动正是按照这一步骤实施的：通过甲午战争，攫取了台湾，后又将福建划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通过日俄战争，攫取了中国东北南部的独占权。从南（台湾—福建）北（南满）两路打进了中国内地，奠定了牢固的侵华基础，接着将是向中国内地进一步扩张了。

早在 1908 年 9 月 25 日，日本的第二届桂太郎内阁制定的《对外方针政策决定》中，便已提出了“在中国国内扶植我国势力”的方针。1911 年 10 月 24 日，西园寺内阁通过的《对清政策》，再次明确规定“关于满洲问题的根本解决，有待于对我最有利时机之到来，今后应特别致力于在中国内地培植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帝国在该地之优势地位”^②。

为具体实施向“中国内地”扩张的方针，1911 年 10 月 28 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曾致电外相内田康哉，提出了利用辛亥革命之机，“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③，与南方汉人长期对峙^④的方案。1912 年

万峰：《日本近代史》（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8 页。

②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册，原书房 1976 年版，第 306 页。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册，第 356 页。

④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2—113 页。

间，日本又趁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之机，与之签订了所谓招商局借款、江苏省铁路借款及“合办”汉冶萍公司借款合同等，力图向英国势力范围的长江流域进行经济渗透。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牵制等原因，日本的上述计划未能得逞，但它并未因此而改变其向“中国内地”扩张的方针。在 1913 年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起草的《对华外交政策纲领》中，除提出要确保并扩大在“满蒙”的权益外，仍声称“必须在各省推进我邦人的和平活动，扶植利益，谋求开拓市场。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物质丰富的华中及华南，更要谨慎周到地推进我之步伐，巩固地盘”^①。

上述史实清楚地表明：自日俄战后不久，日本便已把独霸“满蒙”，进而向“中国内地”扩张，在整个中国确立“优势地位”的方针作为其侵华政策的基本方向及主要目标。1914 年日本对德宣战，出兵侵占山东，只不过是具体实施这一计划的又一步骤而已。至于日本之所以将向“中国内地”扩张的突破口由华中移至山东，除大战提供的良机这一因素外，也有其历史渊源可寻，此点详见后述。侵占山东对日本侵华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使日本在已开辟的南北两路之间又实现了一个新的中间突破，并对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北京形成了直接威胁，从而在战略态势上完成了独霸中国的部署。当年民国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在呈给袁世凯的说帖中称“日本在中国，北有南满，中有汉口，南有福建，若复代德国而居山东之地位，握京津水陆交通之咽喉，其形势最可惊骇”^②，指的就是这种情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册，第 373 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 6 卷，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77 页。

形。无怪乎日本的元老山县有朋在考虑是否对德宣战问题时，曾一再强调“确定对华政策才是决定参战的前提”^①。日本参谋本部次长明石元二郎也声称：日本无论如何必须进攻胶州湾，当然“胶州湾问题不过是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一个可乘之机”^②而已。就连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的《大本营陆军部》一书已承认“此次日德战争，则可视为（日本）推行国策的手段而主动寻求的战争”^③。1914年日本参战与其说是针对德国，倒不如说是借机武力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更为确切。

二、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如上所述，在日俄战后日本历届内阁制定的对华政策决定中，每谈到向“中国内地”扩张的具体方向时，大多指向华中与华南，并未涉及山东。似乎大战前日本并未染指山东的企图，日本攫取山东的计划是在武力占领山东后才酝酿成熟的。以致在中日史学界均有人持这种见解。但征诸史乘，此结论

[日]北冈伸一：《军部与第一次大战中的对华政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208页。

北冈伸一：《军部与第一次大战中的对华政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210页。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校：《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2页。

例如，日本学者久保田次在《袁世凯的帝制计划与二十一条》一文中便主此见。详见米庆余对该文的质疑，载《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1期。我国学者王芸生先生在分析“二十一条”的历史渊源时认为，“除山东问题外，其余各条，自民国二年以来，类有迹象可寻，非偶然也”。“纵使当时无欧战发生，类似二十一条性质之要求迟早亦必提出，惟其范围不至及于山东耳。”（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68—69页。）

则难以令人苟同。事实表明：日本图谋山东的野心由来已久，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而出兵山东，是一次蓄谋已久和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

山东地控南北，物产丰富，仅与日本一水相隔，交通便利，自古以来便是中日交往的要道，因而久已成为日本垂涎之地。

早在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就曾派出大批特务到威海、烟台等地刺探军事、经济情报，测绘地图等，为其侵略山东作好了充分准备。例如，在甲午威海之战前几天，日本一次便派来八名特务，在龙须岛及其附近村庄，以购买食品、鸦片烟为名，四处活动，“得威海、成山兵防状而去”^①；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井上敏夫，在1893年曾三次入威海、二次到烟台进行实地侦察^②；日本著名间谍宗方小太郎更因“潜入威海海军基地侦察立了奇功”，在1894年受到明治天皇的特别召见^③。

甲午战争之际，日本更直接出兵攻占威海，造成中国甲午战败之终局。在1895年1月日本统治集团内部酝酿起草媾和条约时，一些头脑发热的军政要人曾提出了要求割山东、江苏、福建、广东四省等主张。这种贪婪的要求，由于连积极主张割地赔款的陆奥宗光外相都认为不切实际，害怕引起列强干涉而未采纳^④。但《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仍以等待清政府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55页。

^② 山东历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05页。

吴绳海等：《宗方小太郎与中日甲午战争》，《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

[日]陆奥宗光著，伊舍石译：《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15—116页。

偿清赔款为借口，驻兵威海达三年之久。后来，由于中国及时付清了赔款，加之德、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对山东的角逐以及威海人民连年不断的反抗斗争，才迫使日本不得不从威海撤军。

1898年德国捷足先登占领胶州湾，将山东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日本十分嫉恨、忧虑，称此举“势必危及远东和平”^①，日本议院“日夜聚议，大有攘臂出头之势”^②。但由于当时日本对华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图谋攫取与台湾遥遥相对的福建省，因而当德国表示支持它对福建的要求时，才对德国占领胶州湾采取了隐忍待时的态度。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借助本国的私人商业资本加紧了对山东的经济渗透，并同德国资本展开了激烈争夺。

烟台是山东开埠最早的沿海城市，也是日本经济势力最早插足之地。1887年前后，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开辟了通往烟台的航线，随后日本商人开始涌入烟台，1900年已有19户、74人，1908年更增至129户、412人。据1903年调查，日人在烟台开设的规模较大的商行有：高桥、藤田、开济、金升、华信、吉岗、其和、铃木、冈木、津吉等十余家，逐步控制了烟台土洋货重要项目的贸易。特别是甲午战后，随着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势力迅速膨胀，日本的棉纱、火柴、布匹、煤、糖、煤油等商品大量涌入烟台。以日本棉纱为例，1893年开始进口，1896年只有4045担，仅为同年印度棉

[美]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9页。

《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51，第5页。

[日] 航业联合会芝罘支部编：《芝罘事情》，1939年版，第218—219页。癸卯8月6日《国民日报》。

纱进口量（44,428担）的 1/11,但到 1897 年日本棉纱进口量便超过了同年英印棉纱的进口量，达 42,565 担。另外，到 1896 年日本火柴的进口量也超过了欧美。山东的大豆、草辫、野蚕丝、茧绸等土特产品则成为向日本出口的大宗货物^①。这些东西在日本经加工制作之后，有一部分又返销我国市场，给山东沿海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阻碍。

随着日本商人在烟台的扩张和对日贸易的扩大，日本在该口岸的航运势力也迅速增长。详见下表：

英、德、日三国在烟台的航运势力

年份		1899	1900	1904	1905	1906	1913
国别							
英国	艘次	1238	916	1651	1427	1595	1109
	吨位	1203731	882544	1672558	1736660	1776103	1282091
德国	艘次	406	410	499	476	397	214
	吨位	310406	309510	363083	418800	431423	239616
日本	艘次	403	944	496	1589	3330	2237
	吨位	378335	515955	105237	487029	1315027	1178269

资料来源：《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 89 页。

由上表可见，自 1900 年后日本进出烟台港的船只数目和总吨位均已大大超过了德国，并已接近英国。自 1905 年后，日本进出烟台港的船只数目又大大超过了英国而跃居第一位。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史志资料》，总第 7 辑，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7 页。

另外，日本银行和横滨正金银行的纸币也在 19 世纪 80 年代末涌入了烟台，在烟台市面上广泛流通^①。日本银行在烟台虽无分支机构，但由于日本邮局在烟台势力颇大，兼具银行性质，协助日本银行的纸币在烟台流通，严重侵扰了当地的金融市场。

据《胶澳志》记载，从 1901 年起，日本商人也已进入青岛进行商业投机活动。1907 年在青岛的日人已有 33 户、196 人，到 1911 年更增至 51 户、312 人。日本的三井、正金、汤浅、日信、江商、大文、磐城等银行也先后在青岛开设支行。经营进出口贸易的日商还派员赴济南、泰安、大汶口等地设庄，直接收买花生、棉花、牛脂等物，其商业势力范围更扩张至胶济、津浦两路^②。除掠购土特产品外，日商还极力推销日本的布匹、棉纱、火柴等商品，在青岛市场上极力排挤德国商品。这种“巨细兼收、无孔不入”的做法，使日商势力迅速上升，对日贸易额急骤增长。到 1912 年，日本对青岛的直接贸易额已远远超过了德国，成为青岛第一位的贸易对象国。参见下表：

青岛港对德、日贸易统计表（1909—1912 年）

单位：海关两

国别	输出入	1909 年	1910 年	1911 年	1912 年
德国	输入	3713000	4570000	4665000	2843000
	输出	323000	1307000	1597000	1880000
日本	输入	3455000	4515000	4309000	6753000
	输出	676000	853000	1174000	912000

资料来源：[日] 田原天南：《胶州湾》，第 297—298 页。

日本外务省：《在芝罘日本领事馆内状况》，1921 年，第 49 页。

匡裕祥：《烟台笔记》，《新游记汇刊续编》卷 7，第 27—28 页

赵荣等纂：《胶澳志·食货志·商业》，1928 年版。

辛亥革命前后，日本商人在济南也先后设立了日华公司、东南公司书药局、东亚分公司、华和公司、三好堂等商业机构^①。1911年，日人还在济南创办了第一家日资企业——日清火柴厂，日产火柴23吨^②。为“保护”日商在山东的利益，1913年日本政府也在济南设立了天津总领事馆济南分馆。

日商不仅在烟台、青岛、济南等开埠城市设立商行，而且还把势力扩张到了未开埠的龙口。宣统年间，外商群集龙口，设立各种行栈，日商有三井等洋行。1911年，日本还曾派商人30余名前往调查，拟在龙口建立商品进出口基地，独霸该地商权^③。

另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商人的资本也开始侵入山东的民族工矿业。例如，1908年日本东和公司通过贷款（贷款额为8万日元）的方式，侵入了华人的“博东公司”，开采博山的煤矿^④。1912年日本的三井洋行与华商裕丰德在烟台合办了“三裕”制丝工场^⑤。

随着日本经济侵略势力在山东的日益增强，特别是随着日俄战后日本向“中国内地”扩张的野心日趋膨胀，德国统治下的青岛及山东地区便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亟欲攫取的目标。到20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各国争夺世界霸权、重新瓜分殖民

①《山东史志丛刊》，1990年第4期，第46页。

②金曼辉：《我们的华北》，第135页。

③《东方杂志》第7卷第10期，第300—301页；《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4期，第20页。

④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3页。

⑤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852页。

地的斗争日益加剧，世界大战的爆发已洞若观火，日本更加紧了侵略山东的各项准备。据《胶澳志·大事记》记载：1913年3月，旅顺日本民政署长吉丰次郎曾来青调查；同年5月，日本外相加藤高明来青游历，日本第二舰队来青寄泊；1914年3月，日本外务省书记官芳泽谦吉来青游历；驻南京日本总领事船津辰一郎来青调查；日本众议院议员德川庆久、蜂须贺茂、韶曾我等来青游历；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大连民政署长大内丑之助来青调查……^① 日本政府要人及驻华殖民头目如此频繁地在青岛出现，说明早自1913年起日本便已加紧了与德国争夺山东的实际准备。而“突然”来青岛寄泊的日本第二舰队就成为大战中日军封锁胶州湾的主力。

上述史实十分清楚地表明：日本图谋染指山东，至少可上溯到甲午战争时期，并且一以贯之，从未放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出兵侵占山东是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

三、内外交困的局势促使日本走上战争冒险

转移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改变在华的劣势地位，也是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的直接动因之一。大战前几年，日本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

在国内，财政危机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日本统治集团长期以来奉行的对外侵略政策，造成了军事费用和海外殖民地开支负担过重，致使日本背上了一身沉重的

山东省历史学会编：《山东近代史资料》第3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9—70页。

外债。到 1914 年，外债总额已达 20 亿日元，超过同年租税收入的 6 倍，陷入了已无法支付外债利息的窘境。在难以借到外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一再增加国内捐税，从而激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而日本陆军仍逼迫政府再增设两个师团，并于 1912 年 12 月搞垮了西园寺内阁，先后组织了桂太郎和山本权兵卫两届军阀内阁。军部的独断专行，无异于火上加油。1912—1914 年，日本人民要求减税、废税的斗争与反对军阀政府任意扩充军备的斗争相汇合，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护宪运动”，接连冲垮了两届军阀内阁。这是自明治初年以来，第一次靠群众斗争的力量打垮反动内阁的事件。因发生在嘉仁天皇登极不久的大正初年，故日本史上称之为“大正政变”^②。1914 年 4 月上台的大隈重信内阁仍回天乏术，处于军部期待扩军备战和民众要求废税减税两者夹击的困境之中^③。

在国际上，日本同列强争夺在华“权益”的形势同样令统治阶级忧虑。在东北，日俄战后日本虽将东三省南部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以“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相标榜的美国却联络英、法等国，一直在东北同日本争夺对铁路的控制权；而且，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经营期限十余年后即将期满。这一切，都使日本的统治阶级深感在南满的统治地位并不巩固。因此，在 1911 年 10 月 24 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对清政策》中，便提出了要求“延长满洲租借地

[日]井上清著，宿久高等译：《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18 页。

② 万峰：《日本近代史》（增订本）第 457 页。

[日]今井清一著，杨孝臣等译：《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82 页。

的租借期限，解决有关铁路的各项问题，更进一步确立帝国在满洲的地位，以根本解决满洲问题^①的方针。

在关内，日本虽将福建省划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在辛亥革命后列强争夺中国矿权和路权的角逐中，财力薄弱的日本却力不从心，节节失利。例如，对汉冶萍公司，日本虽通过贷款及预付矿石和生铁货款等手段，确立了对该公司的财政控制，但它在 1912 年策划的中日合办该公司的阴谋却未能得逞。为扩张在长江流域的势力，1913 年 8 月，日本曾向英国提出合作修筑湘宁铁路（由南京经南昌、萍乡至湖南）；1914 年 2 月又请求英国提供资金援助，以修筑福州经南昌至汉口的铁路，但结果都因遭到英国的拒绝和反对未能得逞^②。日本一方面同英国争夺长江流域的铁路权，一方面又向竞争对手请求资金援助，这就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而又实力不足的矛盾。1914 年 7 月号的《中央公论》无可奈何地哀叹：“贫困之日本此时不能在中国大力扩张利权，乃天数所使然，只能隐忍待时，等待再度发展之机。”

恰在这时，欧战爆发了，意想不到的“良机”突然降临日本。它使日本统治集团不仅可以借参战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借战争动员满足军部的扩军要求，通过向交战各国供应军需品，促进日本经济的繁荣，使日本从政治经济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而且可以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租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第 356 页。

[日] 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390 页。

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 391 页。

借地和德属太平洋诸岛屿，甚至有一举而独霸中国的可能。无怪乎日本的统治者都把这次“欧洲的大祸”看作是“大正新时代的天佑”，并不顾英、德等国一再阻挠，迅速作出了参战决定。

四、大战爆发后的中国形势有利于日本侵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中国基本上处于英、俄、美、法、德、日六大强国的联合控制之下。大战的爆发，则使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力量对比和争夺权益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英、俄、法、德等国忙于在欧洲厮杀，无暇东顾；且英、日之间结有第三次同盟，日、俄之间又有第三次密约，日、法之间也签有协定，可以料想三国为保住各自在华的既得权益，并防止日本倒向另一方，均不会过分为难日本；美国虽未立即参战，但其视线也集中于欧洲，而且其海军尚未强大到可以跨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成了亚洲唯一强大的力量，摆脱了欧美列强的牵制和强大的竞争对手。

当时统治中国的袁世凯政府虽已控制了全国多数省区，但统治的根基并不巩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日本为活动基地，决意倒袁；为解决财政困难而进行的对外借款谈判也由于欧战的爆发而无所进展。加之，袁世凯权欲熏心，正酝酿自立为帝。对内既多所顾虑，对外自然无法全力以赴。袁政府的脆弱决定了其应变措施软弱无力。

欧战爆发之初，袁政府便已预感到交战双方随时都有可能把战火引燃到在华租借地的威胁，因而一开始便积极筹划防范战祸东来之方策。8月3日，北京政府外交部便通过美国

驻华使馆代办马克谟和驻美公使夏偕复同当时中立的美国政府接洽，希望美国出面劝告参战各国不要在包括租借地在内的中国领土和附近水域进行敌对的军事行动^①，并分电驻俄、德、法等国公使，希望探听战区有无局限在欧境之可能^②。6日，袁政府又正式宣告中立，对外声明中国“决意严守中立”，对内晓谕官民遵照本国现行法令及国际公法，“恪守中立义务”，以保友邦之睦谊^③。并明令公布《局外中立条规》24条，要求“各交战国在中国领土领海内不得有占据及交战行为”，“各交战国之军队军械及辎重品，均不得由中国领土领海经过”，“否则，应听中国官员卸去武装，并约束扣留至战事完毕之时为止”^④。同日，又向美日两国提议，由中、日、美三国联合劝告交战各国“限制战区”，使“战祸不至及于东方”^⑤。

对于中国这一正当适时的和平建议，美国政府给予了谨慎但却积极的支持^⑥。而日本对此则大发雷霆。8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接见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无端责问中国是否想联美反日，公然声称“宣言限制战区，如他国不听，须以武力干涉。美总统仅以空言宣告，有何效力。各国大战在即，尚需熟视战机。德虽与日不表敌意，青岛舰队难免与英法冲突。日以

《美国外交文件》，1914年补编，第162页。

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1987年版，第2页。

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35页。

⑤ 《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6页。

⑥ 7日，美国答复说“国务院对此问题正在慎重考虑”；8日又说“限制战区事，专候袁大总统来电”。《美国外交文件》，1914年补编，第163页；《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18页。

英国同盟关系，如东方有战，日本不能中立。总须东方德舰灭尽，海面方告和平”^①。10日和13日，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西吉又奉日政府训令两次到外交部责难：“此等关系东方重大事件，中国何径先向美邦提议？”^②并逼迫外交总长抄示与驻美公使的往来函电，供日政府审阅。接着还诈称日本掌握了“最确消息，美国太平洋舰队拟向东方开行，此事之原因，系出于贵国大总统之意”，并威胁说“万一生出误会，（日）政府迫于不得已，难保不为必要之措置”^③。在外交威胁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以取缔流亡在日本的反袁势力，维持中国治安为诱饵，迫使袁世凯就范。表示“不独取缔亡命问题，既关于维持中国大局。中政府如有希望之事，由当局者真心坦怀而与日本协商，日政府亦愿为亲切公正之措置，随事为必要之援助”^④。在日本的威胁利诱之下，袁政府只得取消了此项建议。

北京政府限制战区的建议受阻后，地方有识之士乃力陈收回青岛之主张。8月12日和13日，江汉关监督兼湖北交涉员丁士源、山东将军靳云鹏、山东巡按使蔡儒楷等人先后电陈北京政府，请向德使要求收回青岛及胶济铁路，以免山东大局陷于危险。此时居留中国的一般德国商人洞悉日本谋夺青岛的意图，也私自倡议将胶澳暂行交还中国^⑤，以杜日本之借口。在此背景下，北京政府外交部乃将收回胶澳一事探询德国驻华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0页。

《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36页。

《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42页。

《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41页。

^⑤ 《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40页。

使馆的意见。但此时德国使馆的反应却十分冷淡^①。其参赞表示，此事“德皇必是反对，外部诸公向之建议，必无济”^②。而日本侦知此事后，又向袁政府施加压力，声称“此事不向英日咨，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③。对于日本这种严重干涉中国主权的霸道行为，袁政府不但不予抗议，反而胆怯地声明“并无其事”。袁政府的软弱无能，进一步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器。

总之，世界大战造成了欧美列强从远东后退，削弱了依靠外国资本和列强在华相互制约而维持其统治的袁政府，“从而，欧美列强的牵制、中国的抵抗、日本经济的脆弱性，这些制约日本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都大大缓和了”^④。加上近便的地理条件和相对的军事优势，就“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⑤。

五、参战外交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初是各以英、德为盟主的欧

国内许多史书认为。此时德国驻华使馆参赞曾主动与袁政府交涉交还胶澳事宜，而北京政府竟不敢接受。此话不确。台湾学者张水木在研究了大量档案资料后指出：德国驻华使馆对交还胶澳的初步反应是否定的。8月15日日本发出对德通牒后，马尔参确曾多次拜见过外交总长孙宝琦，提议将青岛直接交还中国，但也纯系个人主张，并非德政府之本意。见张水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国对德外交政策》，《近代中国》，1984年39期，第23页。

《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47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1页。

[日]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中译文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第206页。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洲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之间的战争，日本并无参战的理由。日本要利用欧战爆发的有利形势达到侵占山东进而独霸中国的阴谋，必须首先制造对德宣战的借口，消除有碍于日本参战的阻力。为此，日本展开了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

首先，日本利用英国的矛盾心理，竭力争取英国的谅解和支持。

战争初起时，英国并无意将战事扩大至远东。英国外相葛雷深恐一旦战事延及中国领土领海，势必引起中国的骚乱，影响英国的对华贸易，损害英国在华的优势地位。因而，8月1日葛雷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未预见到英国因同盟关系有向日本求助的可能性”^①。但日本决意趁火打劫，不顾英国的上述表示，仍主动提出了参战的请求。8月2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宣言，表示“万一时局转变，英国投入战祸，以日英协约目的或濒危境，日本以协约义务，必至执必要之措置”^②。日本政府认为，只有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应邀参战，才能出师有名，掩盖它侵略中国的真实目的，故而竭力争取得到英国的正式邀请。与此同时，则加紧进行对德作战的军事部署。到8月3日，日本第二舰队在佐世保已作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陆军参谋本部已着手制订进攻青岛的作战方案^③。

对于日本参战的请求，英国心存疑虑，颇为矛盾。它既害怕日本乘机扩大在华势力，侵犯自己的在华权益，又担心日本占领德属太平洋诸岛会同澳大利亚和美国引起纷争；但另一方

① [日] 植田捷雄：《东洋外交史》，下，东京大学出版社1969年版，第423页。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34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397页。